

Peace

东亚 区域意识与 和平发展



主编 宋成有 汤重南



四川大学出版社

0731.00-53

Peace

东亚 ●
区域意识与
和平发展



主编 宋成有 汤重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慧宇
特邀编辑:张力军
责任校对:朱兰双
封面设计:邹小工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宋成有,汤重南主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9

ISBN 7-5614-2191-5

I. 东... II. ①宋...②汤... III. 国际合作-研究
-东亚 IV. D8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3922 号

书名 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

主 编 宋成有 汤重南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印 刷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8
字 数 481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1~600 册
定 价 28.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话:5412526/5414115/
5412212 邮政编码:610064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印刷厂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 言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等两大历史潮流澎湃激荡。面对这汹涌而来的历史潮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值得注意的是：在区域化进程中，东亚区域化对比明显。东南亚的区域化进展迅速，在国际经济领域举足轻重的东北亚区域化却举步维艰。何以至此？颇有探讨的必要。这种探讨，不只是各国政治家、外交家的份内事，也是各国学者、企业家、有识之士的历史责任。为此，需要解决很多问题，东亚区域意识问题即是其中之一。

2000年5月3日至5月7日，中日韩三国近百名学者聚会四川成都，利用中国“五一”国际劳动节首次宣布放长假的大好时机，出席了题为“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办单位有：中国日本史学会、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和中日学术交流中心、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城市研究所、韩国釜山大学韩国民族文化研究所、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等，协助单位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围绕着东亚区域意识这一主题，与会学者提交了60余篇论文或论文提要，分别从古代东亚国家体系、古代中日韩三国间的文化交流与学派思想的消长、政治体制与外交，近代的社会思潮、对外意识、近代化改革、国际格局、亚洲观、当代全球化浪潮、东亚文化的生态关系、区域合作构想、综合安全保障、国家安全战略、大国关系、21世纪经济发展趋势、国际新秩序、中日韩三国关系、中日关系、日俄关系、国企改革、城市间交流、技术转让、次区域经济合作、对外政策、民族主义等多层面、多角度、多领域研究出

发，探讨东亚区域意识的来龙去脉，分析并预测了区域合作的进展与存在的问题，展望东亚和平发展的前景。其中，不同国度学者间的不同立场乃至同一国度学者间的不同立场，均得到展现，彼此在交流中进一步加深了相互理解。当然，论文集编者尊重各国、各地区学者的观点，却未必全都赞同。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近百名与会学者中，青年学者占绝大多数。出现在论文集的作者，有许多人在国际学术论坛上崭露头角，活跃于教学、科研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最前沿。这支学术生力军以年轻人特有的勇气、朝气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在治学道路上大力开拓、拼搏进取，展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术功底和创新能力。同时，也预示了中日韩三国青年学者必将在新世纪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中，承前启后，使东亚学术之树永葆青春活力。

为使读者全面了解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全貌与风采，本论文集收录了 50 余篇论文及论文提要，也收入一篇会议综述。

本论文集的编辑原则有下述几点：其一，论文顺序按古代、近现代、当代等时代区分而依次排列。由于研讨当代问题的论文数量最多，大体划分为区域意识、国际关系、经济合作、政治文化等几个方面编排，并按由北而南的地域方位加以排列；其二，论文除因篇幅过大而有所删节外，基本上原文照录。因此，文责自负，其论点自然是见仁见智，并非代表会议共识或各主办单位的立场。其三，会后自行在其他刊物发表的论文或论文提纲，不再收入论文集。

由于与会学者的通力合作和协办单位的大力支持，也由于东道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城市研究所师生们不辞辛苦的热情接待和周到的组织安排，会议圆满成功。本论文集的出版还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和敬意。

宋成有 汤重南

2001 年 2 月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1)
汉唐王朝的东亚地域意识与东亚诸国间的册封关系	王金林 (1)
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刍议	徐康明 (11)
汉代的易学理论和丁若镛的易学理论	丁海王 (20)
古代日本身份等级的发生	徐建新 (26)
唐与新罗户等制比较研究	金琪燮 (43)
南宋临济禅在日本的传播及其意义	蔡尚植 (48)
《彰善感义录》和明代话本小说比较研究	金秉权 (53)
关于《漂民对话》朝鲜语资料的研究	柳东硕 (58)
赴清使节的文化体验及其影响 ——以《西行录》为中心	李东灿 (62)
论兰学的科学与思想基础	赵德宇 (67)
明治时期攘夷趋向初探 ——以“与万国对峙”为中心	小风秀雅 (78)
内藤湖南的“东洋史”	谷川道雄 (87)
19 世纪 60 年代中韩日三国封建政权近代化改革政策 异同比较研究	李元烨 (94)
伊藤博文与近代中日关系	林 敏 (109)
日本近代亚洲观的文明标尺	李 原 (117)
日本的“不介入”欧洲大战方针与日法谈判	熊沛彪 (129)
环日本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古厩忠夫 (145)
近代中日对东亚的重新认识浅析	杜小军 (151)

有感于韩国对“日本海”称呼异议的提出

——认识对立的背景和解决方案	栉谷主司 (159)
韦伯的宗教理论与中日两国的现代化	张经纬 (167)
论“东亚区域意识”的形成及其嬗变	赵建民 (173)
全球化与东亚区域意识	汤重南 (179)
中日韩三国关系与东亚区域意识	宋成有 (183)
儒学认同与东亚区域意识的强化	陈廷湘 (189)
东亚文化的生态关系与合作方案	李晋吾 (198)
东亚区域联合与中国的作用	金泰万 (204)
自我认识、邻族意识和区域意识	杨宁一 (213)
论中日关于东亚地区合作思想的历史与现实	周维宏 (220)
东亚区域意识与中日相互重新认识的必要性	纪廷许 (228)
构筑 21 世纪东亚国际新秩序	周永生 (235)
综合安全保障与东亚国际新秩序	周季华 (247)
冷战后东北亚地区大国关系与地区国际格局探析	王 蕾 (258)
当代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走向	米庆余 肖 伟 (275)
占领初期吉田外交媾和及安保政策史论	徐思伟 (298)
21 世纪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与东亚地区新秩序	谢定中 (321)
东亚经济圈：日本与中国	王振锁 (345)
中国的崛起与中日关系	黄大慧 (359)
新日美安保体制与东亚安全	汪祖德 (372)
把握未来中日关系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湛贵成 (375)
冷战后日俄关系的发展前景及对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	信金爱 (380)

关于韩国华侨当地化问题的考察

——以问卷、采访资料为根据	崔承现 (386)
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思考	潘 庆 张传杰 (398)
国有企业改革与中国型市场经济模式	严立贤 (408)
中日韩关系与“东北亚经济合作体”	杨绍先 (422)

东北亚地区城市间交流协作的展望与课题

- 以釜山、上海、福岡为中心 金锡俊 (434)
-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技术转移与文化摩擦 张明国 (443)
- 韩国的市民社会和民主主义 李行奉 (458)
- 战后日本对台政策概述 (1952—1997 年) 陈奉林 (466)
- 战后日本对台政策浅析 (1952—1972 年) 臧佩红 (476)
- 东盟的扩展和区域意识的增强 梁志明 (493)
- 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安全问题
- 云南省参与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例案研究
..... 杨洪常 (508)
- 试论冷战后东盟的发展 李 敬 (531)
- 民族主义基本问题研究述评 戴 宇 (541)
- 会议综述 王 蕾 (554)

汉唐王朝的东亚地域意识与 东亚诸国间的册封关系

王金林

中国的东亚地域意识，并不是近代以后才形成的，早在周代就已有这种意识存在了，至汉唐时代则日臻完善。当然，当时的地域意识与近现代的地域意识有着很大的差别。

周代时期推行的邦畿制度，明显地体现了当时的地域意识。

关于周代的邦畿制度，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见解。有的说，周代实施的是“五畿制”（亦称“五服制”）；有的说，周代实施的是“九畿制”（亦称“九服制”）。所谓“五畿制”，就是以王畿为中心，将天下分为甸、侯、绥（宾）、要、荒五畿。《国语》载：“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九畿制”则是以王畿为中心，将天下分为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蕃）九畿。“九畿制”与“五畿制”相比，只是地域范围更广、区域划分更细而已。两者的基本的地域意识则是一致的，即以王畿为中心，依据与统治者的亲疏、臣服的程度划分地域的等级。“五畿制”的甸、侯、绥（宾），“九畿制”的侯、甸、男、采、卫是周天子统治的区域；“五畿制”的要、荒，“九畿制”的蛮、夷、镇、藩（蕃），则是外蕃之国。汉代学问家郑玄在其所注《周礼·秋官》篇中对“蕃国”有如下注释：“蕃国，九州之外夷服、镇服、蕃服也。曲礼曰：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这里所述及的“东夷”，以及“北狄”的一部分地区，即是今日所谓的“东亚”地区。

古代“东夷”的范围，以及其范围的具体国家，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相应的或缩小，或扩增，但其基本地域并无大的出入。

中国历代王朝，对东夷诸国的了解，是随着彼此交流的深入而不断增多的。我国史书中《东夷传》的记载，便是这种知识的结晶。《后汉书》记载道：“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①在西汉时期，时人已知的东夷之国，主要有朝鲜、濊貉、句丽、倭等国；东汉时期有夫余、挹娄、高句丽、沃沮、濊、韩（马韩、辰韩、弁韩）、倭等国；三国时期有乌丸、鲜卑、骨都、沃沮、肃慎、夫余、高句丽、挹娄、濊、韩、倭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勿吉（旧肃慎）、失韦（室韦）、豆莫娄（旧北夫余）、契丹等国；隋唐时期则有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铁勒、契丹、奚、室韦、渤海以及回纥、东突厥的东部地区。

在古人眼中，“东夷”并非意味着野蛮、落后。班固在其《汉书》中指出：“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逆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②当然，“天性柔顺”并不意味着彼此没有矛盾和纠葛。从汉唐期间的历代王朝的东夷政策来看，大多出于国家的政治、军事战略需要，基本上采取了睦邻安抚之策。只是周边国家违背了王朝的战略目标时，才不得不动用武力。例如西汉武帝发动对朝鲜的战争是因为朝鲜常招诱齐、燕的汉族人到朝鲜，并阻止朝鲜半岛上的其他小国与汉王朝交往。又如唐朝初期，对高句丽和百济的征讨，是因为高句丽不听唐朝谋求朝鲜半岛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之间“永敦聘好，各保疆场”，互释前嫌的调解，以及百济明奉唐朝，暗结高句丽，破坏半岛平静局势所致。

当然，支配这种谋求周边睦邻战略的指导思想，乃是以我为中心的大国思想。唐初，侍中裴矩、中书侍郎温彦博曾向唐高祖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③这句话，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列朝列代王朝对周边国家的基本

国策。汉唐王朝正是在“太阳之对列星”的思想指导下，构建“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④的汉唐世界的。东夷便是“四夷自服”的汉唐世界的重要一环，被受到特别的重视。另一方面，从东夷各国的情况来看，处在汉唐强大势力的影响之下，从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全考虑，也迫切需要与之加强联系和交流。正是这种双向的需要，促进了汉唐期间，中国与东夷诸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发展。汉唐期间的东亚地区的政治、军事关系，主要体现就是中国的历代王朝与东夷诸国之间建立的朝贡—册封体制，即周边国家以臣的身份，向中国的王朝纳贡，而中国的王朝则以宗主国的身份，向东夷臣服国家封爵授官的制度。册封制度始于何年，至今尚难断言，但东汉王朝时代已经存在则毫无疑问。据史籍记载，汉光武帝 30 年封濊国渠帅为县侯；^⑤44 年封韩国廉斯人苏马靛为汉廉斯邑君；^⑥57 年赐倭奴国以印绶。^⑦汉光武帝所赐倭奴国的这枚金印，已于 1784 年在日本福岡县的志贺岛上发现，金印上刻“汉委奴王国”五字；^⑧120 年夫余王遣王子尉仇台来汉贡献，汉安帝赐印绶金綵，^⑨等等。

册封体制的完善是在南北朝时期。其时北魏与南朝从军事战略出发，积极开展对东夷国家的外交活动，并对朝贡之国采用册封官爵和军爵制，力图通过这种政治手段，把东夷国家纳入各自的军事联盟之内，以削弱对方的力量。据史籍记载，与北魏有册封关系的国家有高句丽，与南朝有册封关系的国家有高句丽、百济、倭国。

当时，高句丽的地理位置处于北魏、百济之间。对高句丽来说，在与百济对峙中，能与北魏结盟，自己就无后顾之忧。因此，高句丽王积极采取亲北魏政策，争取北魏的册封。值得注意的是，高句丽为了防止与北魏关系的变化，在与北魏结盟的同时，开展“越境外交”，又与南朝结盟，接受南朝的册封，借以牵制北魏。高句丽国王高琬、高云、高安、高延相继从北魏和南朝接受官爵和军爵的册封。

北魏赐予高珽的封爵是“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其死后，又被追赠为“车骑大将、太傅、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⑩高珽之孙高云继位后，除继承高珽的全部爵号外，新增加了“使持节”官爵。高安被封为“安东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高延被册封为“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由此可知，北魏给予高句丽王的最高爵号是“使持节”和“车骑大将军”。然而，他们在南朝得到的爵号是“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高厉王、乐浪公”。高云从南朝受到“征东大将、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的册封。^⑪

百济从自身的安全着想，本希望从北魏获得支持，以抵御高句丽的威胁，因此曾遣使北魏表示臣服，要求予以军事援助。可是北魏不希望介入百济与高句丽之间的矛盾，更不愿打破与高句丽结盟后形成的东北边境的安宁，因而拒绝了百济的要求。由此，百济的外交重点转向南朝，以“远交近攻”的策略维护国家的安全。

百济在与南朝结盟前，早与东晋政权有过册封关系。百济王余句、余晖、余映先后从东晋受到过“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使持节、都督、镇东将军、百济王”和“使持节、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的册封。^⑫

南朝在对高句丽、百济册封的同时，也对倭国（亦即大和国）进行了册封。当时的倭国，意欲在朝鲜半岛扩张势力，但受到高句丽势力的阻碍。为了能够在东亚国际舞台上抗衡高句丽，必须寻求大国的支持。这就导致了倭国与南朝的册封关系。

相当于南朝时期的倭国，先后有赞、珍、济、兴、武五位大王执政。期间，倭国与南朝的交往相当频繁。倭王赞首先从南朝接受册封是在421年，册封的爵号虽然没有明记，但推测似是“安东将军、倭国王”。^⑬424年，赞又受到宋文帝的册封。据《古今图书集成》载：“元嘉二年，倭国遣使人贡，诏授大将军”。^⑭倭王赞之后，

倭王珍遣使南朝，宋文帝册封其为“安东将军、倭国王”，并对倭王的13位属臣分别授予平西将军、征虏将军、辅国将军等军爵。倭王济被册封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⑤在倭五王中，得到最高爵位册封的是倭王武。他先从南朝宋顺帝处得到与倭王珍一样的封爵。宋亡后，从齐高帝萧道成处获得“镇东大将军”封号，其他原有的“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倭王”称号依然如故。齐亡梁兴，他又从梁武帝处得到“征东大将军”封爵。可见南朝诸王对倭国的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视。

唐代时期，维系唐朝廷与东亚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关系的手段，除了继续采用朝贡—册封制度外，还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灵活地采用其他手段。根据史籍记载，大致采用的手段，一是对高句丽、百济、新罗、渤海等国，实行朝贡—册封制；二是对契丹、奚、铁勒、回纥等采用朝贡—册封和联姻双重手段；三是对日本采用朝贡不册封手段。

据载，唐王朝对高句丽的三代王进行过册封。624年唐高祖册封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677年唐高宗册封高藏为“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都督、朝鲜王”。高藏之孙宝元继位后，被授予“左鹰扬卫大将军、忠诚国王”。^⑥

唐王朝曾向百济的三代王，即扶余璋、扶余义慈、扶余隆册封爵号。扶余璋的爵号为“带方郡王、百济王”，死后追赠“光禄大夫”号。义慈的封爵，除“带方郡王、百济王”外，还封为“柱国”，死后追封“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扶余隆则被封为“光禄大夫、太常员外卿兼熊津都督、带方郡王”。^⑦

百济与高句丽两国先后于663年和668年灭亡，朝鲜半岛逐渐由新罗统一。因此，唐朝与新罗的册封关系延续时间较长，从唐高祖武德年间（618年—626年）延续到唐武宗的会昌年间（841年—846年）。唐王朝先后向新罗的17代王封爵。新罗王所受到的册封爵号，一般为“乐浪郡王”、“新罗王”、“鸡林州都督”、

“宁海军使”、“使持节大都督鸡林州诸军事”等。此外，尚有被册封“柱国”、“辅国大将军”、“太子太保”、“校检太尉”的。最高的封爵号是“开府仪同三司”，属唐朝文散官第一阶。受此爵号的新罗王有金真平、金春秋、金法敏、金兴光、金承庆、金宪英、金乾运、金俊邕、金彦昇、金景徽等。^⑭

对渤海国的册封，大祚荣及武艺两代均受到“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的册封。第三代钦茂除继承其父爵号外，在天宝年间（742年—755年）和大历（766年—779年）年间，先后加封为“特进”、“太子詹事”、“司空”、“太尉”。继钦茂继位的大嵩璘，除保持“忽汗州都督、渤海国王”外，还被册封为“金紫光禄大夫”、“校检司空”、“校检太尉”。此后的渤海国诸王，虽然依然受到唐朝廷的册封，但爵位均未超过上述诸王的爵位。^⑮

与朝鲜半岛诸国和渤海国不同，处于唐朝北侧的契丹、奚、回纥、铁勒，常常在谋求册封的同时，乞求和亲。对此，唐朝廷也从“结以婚姻，缓轡羁縻，亦足三十年安静”，^⑯或“欲固其心”^⑰的目的出发，积极予以响应。据统计，铁勒乞婚1次，契丹请婚2次，回纥请婚4次，奚国请婚2次。9次和亲中1次是回纥王女嫁唐朝的郡王，8次是唐公主下嫁。9次和亲中，除贞观十六年与铁勒的和亲，由于铁勒王未能如约按时交付聘礼而失败外，其余8次均得到了实现。9次和亲情况如下：

642年（贞观十六年），唐太宗敕许新兴公主嫁铁勒首领夷男，最终未成。

716年（开元四年），唐玄宗以宗室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下嫁契丹王李失活。

717年（开元五年），玄宗以外甥女辛氏为固安公主，下嫁奚国王李大辅。

722年（开元十年），玄宗以成安公主之女韦氏为东光公主，嫁奚国王鲁苏。

同年，玄宗以燕郡公主嫁契丹王郁于。

756年（至德元）年，回纥王请求将女可敦妹嫁敦煌郡王承宗，肃宗封可敦妹为毗伽公主，促成和亲。

758年（乾元元年），回纥王乞婚，肃宗以幼女宁国公主嫁唐延顺。

783年（建中四年），回纥王以请和亲，德宗诏许咸安公主下嫁。

821年（长庆元年），穆宗继位，回纥王遣使求婚，穆宗以宪宗之女太和公主下嫁。

终唐一代，日本与唐的关系是比较特殊的。当时的日本，在文化方面积极地接收中国文化，而在政治方面则采取事大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倭本位）的双重国策。在以唐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中，日本国王是不受册封而又行朝贡的“化外慕礼的外臣”。^②正是这种既事大又自我为中心的矛盾国策，导致了日本遣唐使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使命。作为日本国使的13次遣唐使，是根据日本国内和东亚的形势确定其使命的。根据不同时期不同使命分析，遣唐使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630年—659年间的4次遣唐使为第一期。这期间，日本在国内实行改革，期望从中国直接输入先进文化；同时，由于“倭本位”的自我中心主义十分强烈，为维护自己在朝鲜半岛已经取得的利益，不得不特别关注唐朝对朝鲜半岛的政治、军事行动。因此，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具有双重使命，一是吸取先进的唐朝文物制度；二是搜集唐的军事情报。第二期遣唐使是665年—669年间派遣的2次使节团。这时，由于百济和高句丽的相继灭亡，唐朝支持的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在这种背景下，日本遣使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自己在东亚国际舞台的孤立，向唐朝表示亲和。从702年—752年派遣的4次遣唐使是第三期。这期间正是唐王朝经过百年的发展，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成为强盛帝国的时期，而日本，也经历了数十年的内政改革，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在这一背景下，第三期遣唐使的使命，一是更广泛和全面地吸取唐的先进文化；二是以开放的唐朝为

舞台，接触、了解和认识中国以西的亚、欧世界及其文化。与前三期遣唐使相比，777年—838年派遣的第四期的3次遣唐使的主要使命，已不再是吸取唐文化和侦察唐的军事情报，因为那时唐朝已经衰弱，日本已在消化吸收唐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平安文化。从史籍记载可知，这一时期的遣唐使赴唐的目的，主要在于迎接尚未回国的日本人和祭奠死在唐的日本朝廷的使者、学者和僧人。^②

东亚各国就在上述的朝贡、册封、和亲、频繁派遣国使和民间交流的过程中，彼此的文化得以沟通，尤其是先进的汉唐文化向东亚诸国的传布，对东亚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经过东亚各国朝廷和人民的共同努力，最终使东亚成为共同繁荣、和平睦邻的地区。这一地区也被后人称为“汉唐文化圈”。

综上所述，拟可结论如下：

第一，东亚地域意识，早在我国周代时已经存在，直至汉唐日渐完善。

第二，东亚地域的范围，近代以来有的学者把部分东南亚国家和地域也包括在内，但根据中国史籍记载，中国历代王朝的东亚地域意识范围并不包括东南亚国家，主要包括今日的东北亚地区，即中国的华北、东北和蒙古、俄罗斯的远东部分、朝鲜半岛的朝鲜、韩国以及日本。

第三，汉唐期间，中国与东亚诸国之间是通过朝贡、册封、和亲、遣使方式来构建以汉唐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的。

第四，在东亚诸国的交往过程中，彼此的文化也进行了交流，其中汉唐文化对东亚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唐文化圈”便是这一交流的结晶。

（作者系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

注释:

- ① 《后汉书·东夷传》。
- ② 《汉书·地理志》。
- ③ 《旧唐书·高丽传》。
- ④ 《贞观政要》卷九。
- ⑤ 《后汉书·东夷传·东沃沮》。
- ⑥ 《后汉书·东夷传·弁辰》。
- ⑦ 《后汉书·东夷传·倭》。
- ⑧ 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第3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
- ⑨ 《后汉书·东夷传·夫余》。
- ⑩ 《魏书·高句丽传》。
- ⑪ 《南史·夷貊传下》。
- ⑫ 《南史·夷貊传》、《宋书·夷蛮传》、《南齐书·东南夷传》、《梁书·诸夷传》。
- ⑬ 王金林:《走向东亚国际舞台的大和王权》,载王金林、汤重南主编:《走向国际化的日本》,第1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
- ⑭ 方輿汇编:《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卷33,日本部汇考1。
- ⑮ 《宋书·夷蛮传》。
- ⑯ 《旧唐书·东夷传·高丽》、《新唐书·东夷传·高丽》。
- ⑰ 《旧唐书·东夷传·百济》、《新唐书·东夷传·百济》。
- ⑱ 《旧唐书·东夷传·新罗》、《新唐书·东夷传·新罗》。
- ⑲ 《旧唐书·东夷传·渤海》、《新唐书·东夷传·渤海》。
- ⑳ 《旧唐书·北狄传·铁勒》。
- ㉑ 《新唐书·回纥传》。
- ㉒ 高明士:《隋唐使の赴倭とその仪礼问题》、载《アジア游学》,第149~150页,1999年第3期(特集东アジアの遣唐使)。